

汉唐时期的合浦

——以传世文献为视角的探讨

古代合浦地区自秦汉时代被纳入中原王朝大一统秩序的版图伊始，其史前时期的生态文明即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用夏变夷”的历史周期。滨海地域的合浦，在汉唐时期既拥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美誉和光环，亦经历了自身社会变迁中的种种波折与起伏。探讨合浦地区于汉唐之际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读岭南地区进入大一统秩序后的开发历程及中古时代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社会生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秦对岭南的经营

（一）初设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展开了对岭南的军事行动。在征服岭南的过程中遭到了强烈的抵抗，为此秦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淮南子》：“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1]经历五年的战争，岭南地区终于纳入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秦始皇三十三（214年），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即属于象郡^[2]。秦王朝在岭南除了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以及县级官吏，还保留了越人原有的统治结构。因为赵佗占领桂林和象郡后，诸县仍由雒将治民。^[3]

（二）开凿运河

为了解决征服岭南战争中转输困难，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修筑灵渠。历史证明，这条运河不仅有助于秦对岭南的征服，还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从而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了起来。合浦郡通过湘漓水道这一重要交通线可以实现更方便快捷的物资交换。海外的物资在经合浦港的中转后被输往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物资也通过这一线而达到东南亚、西亚等地。

（三）移民实边

为了控制岭南地区，秦王朝实行强制移民政策。秦大规模向岭南移民的活动共有四次。第一次，平定岭南的当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畧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4]。《史记集解》引用徐广《史记音义》云“五十万人守五岭”，此次移民的数量相当大。第二次，秦始皇三十四年（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5]。第三次，尉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6]。第四次，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7]这几批移民为岭南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对岭南地区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二、两汉的统治

（一）初设合浦郡

秦灭后，南海郡尉赵佗出兵占领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对汉称臣，维持了外部环境的稳定。对内继续推行郡县制，采取“和辑越人”的民族政策。稳定的环境使得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赵佗去世后，继任的国主继续执行臣服于汉的政策。直到南越国第四位王赵兴统治后期，南越国丞相吕嘉公开反叛，并杀掉汉使，“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好为谩词谢罪，发兵守要害处”^[8]。元鼎五年，武帝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击南越。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番禺，其余地区闻风而降，南越国平定。同年，汉朝调整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9]合浦郡下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10]，其郡治为合浦县^[11]。合浦郡所辖地区广大，远超今日合浦县，其所辖范围囊括今日广西北海市、钦州市全部以及防城港市、玉林市大部以及广东省廉江县^[12]。

汉统一岭南后，一方面继承了南越国“和辑越人”的政策，对归顺的南越官吏授予官爵。例如：路博德拜投降的南越国官吏为交趾、九真二郡太守，赵建德封为“海常侯”，赵光封为“随桃侯”，毕取封“瞭侯”。另一方面，汉王朝也逐渐加强对岭南的地区控制。汉成帝绥和元年，在合浦设都尉。^[13]都尉即县尉^[14]，“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15]，通过都尉的设置加强对合浦的管理。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交趾诸郡闭境自守，客观上维护了岭南的稳定。直到光武帝建武五年，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中央王朝和岭南的关系恢复正常。

（二）海外贸易的兴盛

合浦郡南临北部湾，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西延至今越南，东延至雷州半岛。《汉书》首次记载了中国商船从合浦前往诸国的行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屋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6]

这段史料详细记载了汉王朝和东南亚、南亚等国的贸易路线。从合浦、徐闻等地出发可达都元、邑卢没、谶离、夫甘都卢、黄支、皮宗等国，最远者可达印度半岛。

合浦的海上交通线不仅只通向海外地区，同时也可通向东南沿海地区。“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治泛海而至”，但由于“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于是开零陵桂阳峽道。^[17]

《三国志》云：“（建衡元年）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翊、苍梧太守陶璜

由荆州，监军李翊、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18]两条史料皆表明从东南沿海也可浮海至合浦。

除了海上交通，合浦也有着比较便捷的陆上交通。其境内的南流江与其他水系相连，因此合浦同其他地方的联系也很便捷。当时中原等地的货物主要有三条通道进入合浦境内：

(1) 湘漓水道。沿长江水系由湘江经灵渠进入漓江，经桂林、昭平、梧州，再有梧州浔江而上，经北流河到玉林平原，过桂门关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2) 红水河水道。红水河上游有南、北盘江，两江相汇后经天峨、来宾到达郁江，溯郁江而上至贵港，又陆行进入玉林，再沿南流江到达合浦港口。(3) 左、右江水道。驮娘江合西洋江相汇后经百色、田阳、田东，于南宁地区与左江相汇，流经龙州、崇左、扶绥到达邕江。自邕江顺流至横县上案陆行至灵山，再从武利江经南流江到达合浦港。^[19]

合浦港通过国内外的交通线将西亚、东南亚、印度半岛等海外地区同国内衔接起来。现代考古在合浦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南亚、中亚、西亚的舶来品如琥珀、玛瑙、水晶、玻璃等，皆反映了当时中西海上交流的盛况。

(三) 社会风俗的变迁

东汉初，一批循吏在岭南为官，他们对岭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光武帝时期，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真郡太守。到任后，他们采取措施进行移风易俗的改革。史称“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习，导之经义”^[20]，推行中原先进文化。《资治通鉴》评价：“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礼仪。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21]锡光和任延致力于将先进的文化、耕作技术传播到交趾地区，这对当地的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他们的这些措施对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其他地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原等地的移民对合浦的开发也有着重要意义。汉末三国时人便认识到汉代徙往岭南的罪人对岭南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三国志》记载：

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22]

这些罪人中又有一批具有极高知识文化的人。两汉史料记载大量官员被贬到合浦，比如：淳于长、王章、毋将隆、董恭、侯傅晏、史立、赵昌、中山王后卫氏、孔崇、邓迭、邓磊、郭举、郭瑛等。前人此有所关注，蒋廷瑜对两汉“徙合浦”进行了基本的梳理和讨论，注意到这些被迁徙到合浦官员及其亲属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合浦社会当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3]杜树海根据日本学者大庭修的观点推断两汉时期合浦郡等地跟中原王朝的关系远比西北地区更为融洽、稳定，中原王朝在合浦郡的控制力较为强劲，骆越民族已

不能像西北民族那样形成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政治、军事势力而他们是合浦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24]一方面，中央政府将犯罪的官员发配到合浦说明中央政府对合浦郡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中央政府能保证犯罪的官员及其家属不会在此地对王朝稳定造成隐患。另一方面，这些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些可以称之为精英的人物多多少少将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带到合浦，推动着合浦的进步。

（四）合浦人民的反抗斗争

东汉后期，岭南地区官吏选取多有不当。三国吴薛宗上书：“（交趾）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覆”。^[25]《后汉书》记载：“（交趾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既盈给，辄复求迁代，故吏民多怨叛”。东汉末，交趾刺史朱符便因“侵虐百姓，疆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26]而被杀。

合浦官吏贪婪丝毫不亚于其他地区。《册府元龟》：“（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北境尝通商，贩买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饥于道。”^[27]这引起了合浦地区民众不断的反抗。整个东汉时期，合浦郡多次卷入叛乱行动。光武帝建武年间，二征反叛，合浦蛮夷随之响应。东汉末年，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官吏的昏庸腐败，合浦地区反叛增多。安帝元初三年，郁林、合浦蛮夷攻苍梧。汉灵帝光和元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攻没郡县。汉灵帝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囚禁了交趾刺史与合浦太守。

诸多叛乱中最大的为东汉初年二征叛乱。有史料记载二征的反叛是由于交趾太守苏定向征侧之夫索币不得，将其杀掉而引发二征反叛。^[28]尽管在早期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交趾太守索币一事，此种说法的出现已非常晚。但马援在平定交趾叛乱后上书光武帝可以为此事做一脚注。马援称：“太守苏定张眼视钱，喋目讨贼”^[29]。因此，即使无法直接证明苏定向征侧之夫索币一事为实，但可知苏定极有可能为昏庸贪婪之辈。二征叛乱，合浦、九真、日南蛮响应，掠六十五城，直到光武十九年才完全平定，“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30]。此次叛乱后，为了加强控制，马援对涉及叛乱的三郡采取了新的统治措施。

汉武帝平南越国以来，岭南地区推行了郡县制，但在县一级组织很可能是由越人部落首领雒将把持，进行“因故俗治”。《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

汉在灭南越国的过程中大力招降，赐降者以官职，拉拢南越国的官员。同时史料也反映出南越国时期交趾、九真地区还存在着“雒将”。《水经注》引《北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

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可见雒将很可能是越人部落首领之类，汉灭南越国，雒将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执行“治民如故”的政策。直到东汉初，雒将依然存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六年征侧和征贰反，而征侧和征贰即是“雒将之女也”。同时征侧和征贰的反叛引起“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直到东汉初，雒将在岭南依然存在，合浦郡越人可能也有雒将响应二征的反叛行动。

由于这些地区管理体制较为松散，马援在平定叛乱后废除了雒将统治地方的权力，“悉定郡县为令长也”^[31]。同时，在所经过的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马援也注意到越律与汉律相冲突者，“申明旧制以约束之”。最终“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32]马援的这些措施有力的推动了包括合浦在内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

三、两晋南朝时期

（一）两晋南朝的统治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夷人所杀，州郡不安。时任交址太守的士燮表其弟士壹为合浦太守。在士家兄弟的控制下交址、合浦等郡较为安定。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派步骥为交州刺史控制了交州，合浦太守士壹“时贡马凡数百匹”表示恭顺。黄武五年孙权以“交址县远”为由，分合浦北置广州，随后又恢复建置。所谓“分合浦北置广州”当指合浦郡之北的“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从地理分布来看，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的确在合浦郡之北。^[33]黄武七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所谓珠官，《舆地广记》：“成都旧谓之锦官城，言官之所织锦也，亦犹合浦之珠官云”^[34]，珠官大约为官方所产之珠。很快，吴又复称合浦郡。

三国分裂时期，合浦长期属于吴控制。但蜀也曾设官遥领交州刺史。魏平蜀，将蜀遥领交州的制度继承了下来，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咸熙元年(264)，吴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附魏，九真、日南郡响应，合浦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魏晋与东吴争夺之地。魏诏：“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35]，鼓励吕兴进攻合浦。泰始元年(265)，杨稷遣毛晃、董元等进攻合浦，战于合浦古城，吴军大败。但杨稷仍未能取得合浦的控制权。杨稷在这次战争中破吴后，任命毛晃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36]但是未有任命合浦官吏的记录。董元去世后，晋任命王素任九真太守多次进攻交州诸郡，合浦当为晋的目标之一。因为合浦在当时为东吴争夺交州的一个据点。宝鼎三年(268)，孙皓遣交州刺史等击交址却为晋毛晃等败，东吴“兵散还合浦”。建衡元年，东吴“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翊、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址”。^[37]无论是军队败归合浦还是军队于集结于合浦皆可见当时合浦对于经略交州地区所具有的军事意义。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东吴实行珠禁也有一定的启发。

晋太康元年平吴，“分合浦之北为广，治番禺”^[38]，合浦郡北部地区分置广州，而合浦郡仍隶交州。刘宋置越州。《宋书》记载刘宋泰始七年分交宋寿、合浦和广州临漳三郡以及新立六郡百梁、安昌、南流、龙苏、富昌、高兴、永宁为越州。^[39]齐因之，梁陈时期合浦区划变动不见于记载。

（二）国家控制力量的变动

1. 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合浦地区的人口脱籍现象非常严重。《晋书》云：“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40]《晋书》记载合浦郡仅“户二千”，而东汉时期合浦郡有“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户”，尽管有政区调整的因素，但也足以说明人口流失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东汉以来赋税沉重，岭南地区离叛现象多发，一些山高林深之地成为逃避之所。《三国志》云：“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依作寇盗，专为捕逃之藪”。宝鼎二年(267)华核《谏营新宫兴工妨农》称“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41]。另一方面，东汉末年以来，岭南地区战乱频繁，人口迁出。仅三国时期吴和魏晋为了争夺交州等地即发生了多次战争。东晋末，卢循又攻破合浦。因此，合浦多次受到战争直接的影响。苏轼《江瑶柱传》云：“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42]可见为了避乱而迁出合浦者有之。和户口脱籍相对应的是俚獠繁炽。《太平御览》引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可见，合浦及其周边的几个郡俚獠众多，属于俚獠的集中地。晋平吴，陶璜上书称：

“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佺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纔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43]

陶璜对交州地区做了细致的描述，俚獠之人居住在“深山僻穴”，凭着“土地阻险”，“历世不宾”。他们不仅不宾服，还对王朝控制的郡县民众有着很大的威胁。即使在多次的征讨下仍无法荡尽不宾服之人。广州地区不宾服之人多达五万户。交广两地的总体情形如此，合浦郡的情况不会差太远。陶璜要求对于交广两地“唯兵是镇”，采取军事高压政

策以维护稳定。

东晋末年，俚獠的势力依然很大。他们甚至在卢循起义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李子逊、李弈、李脱等人盘结俚、獠，各有部曲。李弈引诸俚帅五六千人为卢循所用。到南朝时期，交广两州不宾的情况仍未有大的改善。刘宋泰始年间，合浦郡附近的临漳郡“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44]《南史》云：“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南齐书》云：“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隋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合浦地区的俚帅陈檀的势力也颇大。

为了控制不宾服之人，从东晋到陈都积极采取措施。东晋政府对于“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采取“因而署之”的政策，“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45]给予服从中央的首领如“酋帅”、“洞主”以王、侯等号。此政策历经南朝不变。例如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后拜为龙骧将军，后又拜为高兴太守。陈末以南平渠帅宁猛力为宁越太守。

对于不服从中央管辖的俚人则采取军事征服政策。整个南朝时期，国家对俚、獠的征伐不断。刘宋陈伯绍“率军伐俚”，萧梁兰钦征讨“长乐诸洞”和陈文彻兄弟。陈广州刺史马靖“甲兵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萧介“征诸山洞”。通过征服，国家在岭南地区大量增设州郡，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和人民进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隋书》称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其后务恢境宇，频事经略，开拓闽、越，克复淮浦，平俚洞，破柯，又以旧州遐阔，多所析置”。合浦所在的越州初设领九郡，随着国家对地方控制加强，越州增设了大量的郡，到萧齐时期最后竟多达二十个郡^[46]。这一时期，郡所控制的人口也在逐步恢复。合浦郡在刘宋时期户籍人口仅有九百三十八户^[47]，到隋初，合浦郡已经增加到近三万户。尽管人口增殖的因素，但少数民族被编入户籍也是户籍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2. 汉人豪族势力及其夷化

在国家将权力的触角逐渐伸向未控制的人群和险峻之地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期地方家族势力仍很强盛。在汉魏时期，北方的家族或躲避战乱或因任官迁居交州，他们在交州地区数代为官，形成颇有影响的家族。其中士燮、陶璜和杜慧度家族是其中的代表。

《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阨，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址太守。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官征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官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官为司徒，辟壹。比至，官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交州

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爨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翦领九真太守、翦弟武领南海太守。

《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在南三十年，威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宋书》卷九十二《杜慧度传》：

杜慧度，交址朱戴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址。父瑗，字道言，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址太守……慧度瑗第五子也，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迁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旷职，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景平元年，卒……以慧度长子员外散骑侍郎弘文为振威将军、刺史。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表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以报所荷，况亲被征命，而可宴然者乎！”

士燮、陶璜和杜慧度家族均来自北方地区，在交州地区父子兄弟长期任官，在州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国家对于他们既有利用的一面也有防备的一面。士燮在去世后，孙权立即从交州地区分置广州，以削弱士家的力量。孙权任命陈时接替士燮之子为交址太守，士燮子拒命被吕岱所杀。士燮家族因此受到牵连，士燮之弟士壹、士翦，士燮子士廞被免为庶人。几年后，士壹、士翦被杀。因此，从交州分置广州一事由于士家的迅速失败而又废广州，恢复原来的建置。相比吉士燮子拒命东吴，杜慧度之子对刘宋王朝则显得十分恭顺，面对宋明帝征其入朝，杜弘文称：“吾仗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汉人豪族势力逐渐蛮夷化。

从杜慧度的曾祖到其父、其子，史料中的杜氏家族没有任何蛮夷化的倾向或线索。在杜弘文格外强调“皇恩”，在病重之时就征，表现出了对中央政府的服从。但从梁陈开始，杜氏已经开始向交州本土溪洞首领转化。^[48]到唐时期，交州杜氏完全以蛮夷首领形象出现在史书中。《安南志略》记载：“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时为安南副都护”。^[49]《资治通鉴》记载：“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越峤书》载：唐懿

宗时期蛮酋杜守澄被唐官员所杀，“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50]杜氏作为汉人移民的后代，其蛮夷化或许说明交州地区从梁陈以来的一个大致倾向。合浦郡的官吏极有可能也是蛮夷化的汉人移民后裔。至少在隋唐时期，这一点是有明确的史料予以证明。这一点将在隋唐部分予以讨论。

（三）港口东移下的合浦

两汉时期，合浦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在对外交流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到三国六朝时期，合浦却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合浦港失去其重要地位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生的。孙吴为了控制好珠，在合浦实行珠禁，禁绝往来之人。合浦人长期以采珠为业，这种政策使得“人以饥困”。因此，盗采之事仍不时发生。《艺文类聚》引三国东吴时期万震《南州异物志》：“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51]直到晋武帝时期，陶横上书称“合浦郡土地饶确，无有农田，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请求“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52]这时才取消了严格的珠禁政策，允许商旅在非采珠季进入合浦。汉末至西晋，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交州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商业陷入衰落，这对贸易口岸的合浦造成了很大影响。交州的对外口岸已经转移到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但由于林邑和吴、晋纷争的影响，交州口岸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干扰。同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船只有了深海航行的条件，船只无需紧靠海岸线航行，去往交州口岸的船只减少。南海国家选择自马六甲海峡以东京南沙群岛穿过西沙群岛以达交、广的航线，不复经海南岛以西各港口。^[53]对外贸易口岸东移，合浦港口再未呈现两汉之繁荣。

四、隋唐时期的治理

（一）沿革

周静帝大定元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开皇九年，平陈。合浦纳入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受到隋文帝废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以及隋炀帝改州为郡政策的影响，隋朝合浦郡也有多次变化。南朝宋以来合浦为越州的下属郡，隋文帝时期废郡，仅保留越州。炀帝时期，改称禄州、合州，后改州为郡，仍为合浦郡。唐初罢郡，复越州。贞观中，改称廉州，因郡有火廉洞。天宝初，复合浦郡。开元初，又复廉州。唐代在岭南地区设置五府七十州，廉州属于容州都督府。

（二）溪洞豪族势力的强盛

尽管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就被纳入了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之下，但是岭南地区却常被认为是化外之地，这种印象直到隋唐时期依然存在。《隋书》记载岭南人“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蹠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

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54]凸显了岭南地区其风俗和中原地区差异较大的实际状况。

东晋南朝以来的豪族在岭南地区长期存在，拥有着很强的势力。钦州宁氏、高凉冯氏、泷州陈氏、雷州陈氏、澄州韦氏、罗州杨氏和苏氏皆为当时十分活跃的溪洞豪族。以钦州、廉州为中心的宁越郡和合浦郡是宁氏家族的活动范围。^[55]王承文先生曾指出钦州宁氏家族是南朝中期至隋唐时期岭南西部沿海最大的溪洞豪族。^[56]明代黄佐《广东通志》云：“南海以西溪洞，自汉晋以来，宁族最大，世为俚帅，蛮獠皆归之”。^[57]史籍中一般记载宁氏为钦江宁氏。明万历时期《粤大记》云：“宁原悌，钦江人。宁氏世为合浦豪族”。崇祯时期修《廉州府志》所载完全一致，可知崇祯时期《廉州府志》关于宁原悌的内容可能直接脱胎于《粤大记》，或两者参考了同一个本子。宁氏和合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隋炀帝时期，炀帝任命宁猛力之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后来宁宣之子宁纯又被唐任命为廉州刺史，因此合浦固为宁氏家族控制的范围。合浦在这一时期和钦州宁氏紧密相关。

五、结论

合浦在汉唐千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一统的秩序逐步建立，其历史轨迹深受中央政权变动的影 响。秦汉时期，国家对合浦郡的治理主要在城镇；两晋南朝时期，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渐扩展到原来不宾服的人群中，因此关于俚獠的史料大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国家在新控制的地区设郡县，因此，合浦郡的管辖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有变小的趋势；隋唐时期，岭南地区豪族势力强大，合浦、廉州地区受到钦州宁氏家族的控制，但是大一统国家也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此一地区的管理。合浦郡和岭南其他地区有着共性，因此了解合浦的发展史对理解岭南地区的开发有着积极意义。合浦郡在岭南地区又有着独特的地位，其历史也有自身的脉络。因此，加深对合浦历史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岭南开发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2]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象郡条注：“南越之地，今招义、南潘、普宁、陵水、南昌、定川、宁越、安南、武戡、龙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阳、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乐、海康、温水、汤泉郡皆是。”《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秦象郡，今合浦县”。
- [3] 参考：方志钦，蒋祖缘编《广东通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 [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 [5] 同上。
- [6] 《史记》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 [7] 袁康：《越绝书》卷八《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8] 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9] 《汉书》卷六《武帝纪》。
- [10]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 [11] 关于西汉合浦郡治现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合浦县，一种认为在徐闻。雷坚在《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引用酈道元《水经注》、杜佑《通典》、王象之《舆地纪胜》等史料证明合浦县杂两汉时期一直为郡治。也有学者从合浦、徐闻是否据有郡治的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支持雷坚的观点。笔者在文中采用雷坚的观点。
- [12] 参考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 [13] 陈昌齐：《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 [14] 《汉书》卷五《景帝纪》。
- [15] 范曄：《后汉书》卷一百十八《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16]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 [17] 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四《地理》。
- [18]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 [19] 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 [20] 《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
- [2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 [22]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
- [23] 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一期。
- [24] 杜树海：《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汉代徙元郡刑大多是‘大逆不道’犯的从犯，徙边郡刑大多是‘大不敬’犯”，“相比之下，徙往南边的无疑是重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逆不道最主要是谋反，企图煽动叛乱，将这种犯罪的从犯和连坐者迁徙到汉代主要敌对民族匈奴、羌、鲜卑等居住地附近，他们就有勾结这些异族策动大规模叛乱的危险”。
- [25] 《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
- [26] 《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
- [27]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一。
- [28] 金鉞：《广西通志》卷九十四《征侧征贰》。
- [29]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30] 《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传坚马列传》。
- [31] 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32]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 [33] 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 [34] 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35] 《广西通志》卷九十八。

- [36] 常璩著，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南中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37]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
- [38]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
- [39] 沈约：《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40] 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41] 《三国志》卷四魏书四。
- [42] 张津等：《四明图经》卷十一《铭》。
- [43] 《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 [44]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 [45] 魏征：《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 [46]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萧齐时期，越州下辖临漳、合浦、永宁、百梁、安昌、南流、北流、龙苏、富昌、高兴、思筑、盐田、定川、隆川、齐宁、越中、马门、封山、吴春俚、齐隆二十郡。
- [47] 《宋书》卷三十九。
- [48] 王承文：《中古岭南沿海宁氏家族渊源及其夷夏身份认同——以隋唐钦州宁氏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一辑，2015年7月。
- [49] 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50] 李文凤《越峤书》卷四《唐》。
- [51] 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
- [52] 《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 [53] 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 [54] 《隋书》卷三十一。
- [55] 刘美崧：《〈新唐书南平蛮〉辨误——兼论钦州酋帅宁猛力及其家族的活动地域与族属》，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 [56] 王承文：《论唐宋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响——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杂录〉为起点的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
- [57] 黄佐：《广东通志》卷五五《宁纯传》。